



从巴南木洞经南川去往贵州的川黔古道，曾有一段险峻之处

茶马古道四十八渡 真有48个渡口吗？

□余道勇

古时，多山多溪多谷的西南地区，交通运输只能靠马驮人挑，于是形成了众多的茶马古道。这些茶马古道遍布于山间沟壑之间，通往西南各地。其中，有一条从重庆木洞码头经巴南、南川去往贵州的川黔古道，在南川三泉，有一段路被称为“四十八渡”。传说行人过此，须经48个渡口，往返过溪48次。果真如此吗？

1

四十八渡在一道峡谷中

如今，从重庆南川城区去往贵州道真，直接上银百高速，半小时即可到达，方便快捷。在高速公路通车前，则需经三泉、半河、马嘴、大有，到达道真县，全程虽70多公里，但山路弯弯，用时要3小时左右。道路经过南川三泉，需要穿过龙岩江峡谷，这道峡谷就是被称为“四十八渡”的地方。车行峡谷内，犹如行走在一线天之间，壁立千仞，水流潺潺，两岸对峙，如穿行于时空隧道。

四十八渡之水，来源于著名的马尿水瀑布。它从高高的龙崖城一侧的马尾处倾泻而下，经石板沟、白庙而至半河，再缓缓流淌于峡谷之间，形成众多的河湾、小潭、浅滩。

此即为川黔古道必经之地。从这道峡谷穿越，翻越马嘴山，方可进入贵州地界。但人们很难想象得到，在没有修通公路和没有汽车之前，在茶马古道年代，这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混沌状态？

清代乾隆年间，南川举人周伯寅作《前游金佛山记》云：

“过此以往，则山不可栈，水不可桥，竹杖芒鞋，凡经四十八渡而后至山麓。其间断石飞峰，恒有落势，十步九折，耳目一新。”周举人生动地描写了峡谷之内的景象，说明其时水过崖边，无路可通，须不断地在溪流两岸寻找落脚点，来来回回四十八渡才能走出山谷，到达山麓。

既然是必经之地，人马非过此不可，又是古道，必有桥或路，然而原始状态却非如此。据民国《南川县志》记载：“四十八渡水，两面削壁，有溪无岸，不可为桥。”也就是说，在明清时期，这里就是川黔古道必经之地，人们要经过这里，只能以石为跳蹬，“聚石以渡，左萦右折”“肩舆牛马，艰辛困蹶”，须历经48次左右萦回才得通过，故名“四十八渡水”。每到涨水季节，急流把石蹬冲走，“石随浪去，人叹望洋。”

2

清代两次整修四十八渡

如此艰难，怎么办呢？这条道路，不仅是川黔地区重要的生活、生产通道，也是重要的物资和经济运输通道。于是，清代南川有两任知县，发动了两次四十八渡通道的整修工程，试图畅通三泉通往马嘴的道路，解决人们的来往通行问题。

先是清嘉庆年间，南川知县蒋作梅于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实施的改道工程。蒋作梅其时方三十出头，意气风发、踌躇满志，决意要在任上做出一番作为。他多次亲往山壑之间勘察，让设计人员设计一条从山上绕道的方案，然后自己带头捐资督修。历时两年，一条绕行于山上之路终告完成。

但是，人们通行其间，还是需要计量成本和劳力的。这条路比四十八渡水绕行了数倍路程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陆路维修不足，为了求近，人们开始逐渐放弃此路。

到了清代光绪年间，陆路逐渐荒芜，人们复行于四十八渡之间。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昆明人张涛出任南川知县。张涛所作《新开四十八渡山路碑

记》记载：“山顶有前县令蒋公作梅原修之路，历年久远，峰高路仄，危险甚于涉河，民久弃之。”也就是说，几十年来，陆路峰高路仄，其危险程度比涉河还要大，人们已经弃掉了。但川黔茶马古道仍然需要通行，而过河过水又诸多不便，张涛见山民商客来往通行困难，“悯民之疾苦无以去，心滋愧焉”，于是启动了第二次四十八渡修路工程。

到张涛知县那个年代，南川开始使用炸药了。张涛亲自到现场踏勘，带动民众踊跃捐资，“或捐资财，或效奔走。”人们在悬崖峭壁之间，开炮凿石，开辟栈道，浅滩之上，架设简易津梁，改变以往“山不可栈、水不可桥”的状况，大大便利了人们的出行和货物的流通。

又历时两年，四十八渡古道终于修通，“吾民从此登坦途也”，人们再次抄近路过四十八渡，经千佛崖、老龙洞、半河等前往马嘴，川黔茶马古道再次成为坦途。半河这个地名，就是因为处于四十八渡之一半，即第二十四渡而得名。当时，甚至有人将此功德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，作诗赞叹说：“唐虞世兮水患洪，疏濬厥惟神禹功……漫云天定人难胜，人谋原可夺天工……贤宰力洵可回天，福星一路颂声作。”贤宰指的就是张涛，可见人们对张涛感恩和认可。

在历任南川知县中，张涛也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、有情怀、重教育、重人才，严诉讼、守公正的好官。他不畏权贵，敢于与恶霸斗争。他在南川任上十年，“习知地方风俗情伪，事事认真，能得要领而有威断。”他喜欢吟诗作赋，每天至少要吟咏一二首。现在西城新桥处的文峰塔、尹子祠的尹邻文社都是张涛所倡建，在南川为“良吏者最”。

时光荏苒，物换星移。四十八渡已为陈迹，随着公路交通的发展，现在穿行于四十八渡峡谷的，不再是马帮挑夫，而是车流和游人，人们可以恣意地欣赏两岸的美景，放松地在清流之间徘徊。无需碑记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享受，就是最好的碑刻！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江津长江边这座纺织厂 抗战时助白沙成为西南之最

□王昌宇

江津往事 寻踪

主办单位：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

天空下着小雨，空气虽凉却清新。乘车、步行、爬坡、下梯坎，我们一行10多人来到江津白沙马项垭长江边上的新运纺织厂旧址。这个如今看起来残破不堪的建筑群，在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却鼎鼎大名，助力白沙成为西南最大的布匹生产基地。

80多年前选址白沙建厂

站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，远眺大江东去，回望10多公里远、梯坎上被树木掩映的新运纺织厂办公室遗址。爬上梯坎，走进厂办院内，陈旧的房屋周围长满杂草，再向四周观看，一座座旧式砖瓦、墙体斑驳的厂房映入眼帘，这就是曾辉煌一时的白沙新运纺织厂。

房屋错落有致，干净整洁，然而却充满沧桑与荒凉。一阵寒风从江边吹来，旁边的枯树，掉下几片落叶，仿佛告诉我们，这里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喧闹与繁华。

多年前，我曾来过这里。当时，带我参观的向导是白沙镇的一位领导，他的详细解说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20多年过去，我至今仍能想起他当时介绍的大概情况：民国时期，全国上下正开展新生活运动，即推行所谓的讲卫生西式生活，后来以失败告终。与此同时，因抗战全面爆发，国民政府迁来重庆。为解决抗日人士家属就业和为新生活运动提供生活用品，于是选址江津白沙建厂。1940年，在白沙镇麻柳湾、马项垭建起新运纺织厂，全名是“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新运纺织厂”。

西南最大的布匹生产基地

江风习习，时过境迁，如今这儿已成为抗战遗址，一些设施设备和物品已成文物。

遗址负责人聂坤刚拿出尘封已久、纺织厂第二任厂长戴文倩的半身标准像照片给我们看。他介绍：1940年秋，新运纺织厂落成。1941年春节左右正式开始投入生产，实行厂长聘用制。当年1月25日妇女指导委员会聘任袁保珠为新运纺织厂厂长。1946年元旦，戴文倩担任厂长。1947年11月至1951年2月，钮孝威任厂长。经过几任厂长的努力，纺织厂逐步建成一整套生产、管理、经营、教育、服务、保障体系，厂子运转得红红火火。新运纺织厂的创建，极大推动了白沙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，织布最发达时，拥有2700多台织布机，成为西南最大的布匹生产基地。该厂生产的纺织用品，源源不断运往前线，对繁荣抗战后方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用。聂坤刚说，那时，老百姓最喜欢白沙纺织厂生产的棉被和日用品。而抗战前线最受欢迎的则是该厂生产的擦枪布，官兵们说，一块擦枪布能用很长时间，擦出来的枪亮铮铮的，打鬼子好使！

冯玉祥来厂募捐3万多元

我两次来这里，都听说宋美龄和冯玉祥曾到过纺织厂。还有人讲，宋美龄来过两次，一次是选址，即1938年她乘水上飞机到达实验区视察。视察时，宋美龄发现永川松溉地区坡度大，交通也不太方便，于是决定在长江下游地带另选地址，很快。选定在江津白沙建厂。其间，宋美龄到过白沙。后来宋美龄到白沙陆军第二医院慰问伤病员时，又到过纺织厂，还从新运纺织厂选调了15名优秀女工到陆军医院，照顾抗战伤兵。据传，有几位年轻的女工与伤病员产生了恋情，后来还组建了家庭。于是，到新运纺织厂找“纺织姑娘”为妻一时传为佳话。

当年冯玉祥将军在白沙镇走了很多地方，每到一处都掀起一阵抗日浪潮。他来到新运纺织厂，深入每个车间与工人们亲切交谈，宣扬爱国思想，鼓励动员大家积极支援抗战，并获得新运纺织厂职工捐款3.4万元。冯将军为表达谢意，当即挥笔题词：“女士袁保珠，办事心不粗。许多好义民，做工有条目。纺织纺得好，最好是毛巾。处处有条理，卫生更不忽，到处能如此，妇女闲不住，这是真新运，不是空口呼。”题词简朴，通俗易懂，朗朗上口，给了全厂职工极大鼓舞。

穿越时空回想当年，那时的白沙、那时的新运纺织厂，一定人潮鼎沸，抗战宣传的场景是多么热烈和壮观啊！

聂坤刚告诉我们，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厂名改过几次，最先改为“公营新运纺织厂”；20世纪50年代改为“四川省地方国营江津县白沙染织厂”，生产白布统售给百货公司；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又更名为“江津县棉纺织厂”。但无论名字怎么改，都改变不了新运纺织厂在白沙人民心中的记忆，改变不了新运纺织厂在抗战时所做的特殊贡献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)

新运纺织厂旧址